

学人自述文丛

冯友兰
自述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学人自述文丛

冯友兰自述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冯友兰自述/单纯编.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
2004.5

(学人自述文丛)

ISBN 7-215-05404-7

I. 冯… II. 单… III. 冯友兰(1895~1990) - 自传
IV. K82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1460 号

责任编辑 鲁元军

责任校对 李接力

版式设计 金·不闲斋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57233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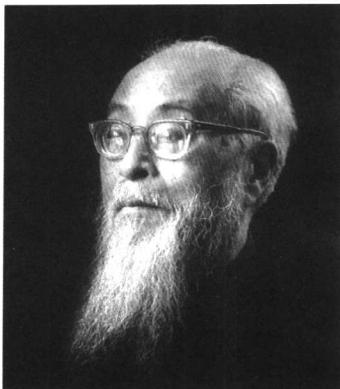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A5 印张 6.125

字数 132 千字 印数 1-4 000 册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6.00 元



谁都不会怀疑，冯友兰是中国的大哲学家，他一生创造了许多奇迹。关于这些，无须我在这里多说，下面只说两点：

◎ 哲学家冯友兰

一是冯友兰哲学的魅力。近年来，多种冯友兰著作脱销，如大部头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、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，都成了书市上的抢手货。如此严谨的哲学著作竟然在日益疲软的书市走俏，不能不归结于其本身的魅力。诚然，冯友兰的哲学不是说教，而是人生哲学或者说哲学化了的人生，自然有其独特的魅力。

一是冯友兰生命的创造力。有人曾问我，最推崇的东西方哲人是哪两位，我直觉地回答是冯友兰和罗素。理由很简单，他们两位是最能在生活中贯彻其哲学思想的人，而且能以哲学滋养其生命。罗素以 98 岁的高龄谢世。他在《怎样度老年》一文中说，人当“工作不息，死而后已”，可见是“明于生死之道”的。

冯友兰是以 95 岁高龄故去的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思绪活跃，不减中年，新论迭出，自嘲为“非常可怪”，实为学术新创见。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期间他还完成了一部 150 万字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这样的工作即便是由中年人用 10 年的时间来完成已经可以称奇了，况且是这样一个已届 90 岁高龄的耄耋老人。因此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从容的哲人风范。有许多人对冯友兰的人生态度充满好奇，曾以“养生之道”就教过他，据说他只回答了三个字：“不……着……急。”

(冯有口吃)

晚年冯友兰十分在乎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为他的学术而存在的。他说，一旦完成了他计划中的写作，那时即使有病也用不着吃药了。

冯友兰的主要著作收在《三松堂全集》中。关于

● 三松堂——北京大学燕南园 57 号，
冯先生的居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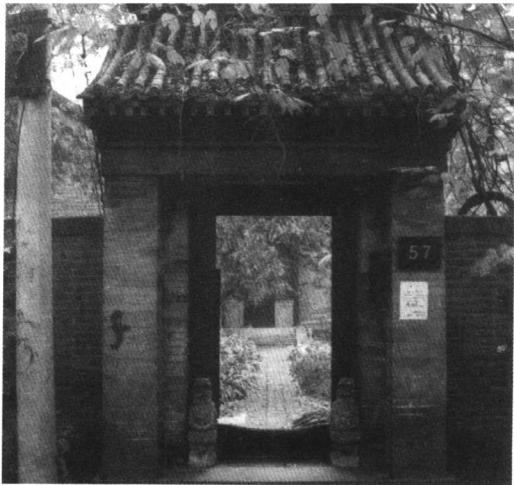


“三松堂”，冯友兰说：

“三松堂”者，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，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，十年动乱殆将逐出，幸而得免。庭中有三松，抚而盘桓，较渊明犹多其二焉。余女宗璞，随寓此舍，尝名之曰“风庐”，谓余曰：已名之为风庐矣，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？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，皆所以寄意耳，或以松，或以风，各寄所寄可也。宗璞然之。

在《三松堂全集》开篇，即是《三松堂自序》。《三松堂自序》不是一书之序，而是其以前著作之总序。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，冯友兰“述先世，叙经历”，“忆往思，述旧闻，怀古人，望来者”。“书中所记，有历历在目、宛如昨日者，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。”（均引自《三松堂自序》之自序）

本书的编写即以《三松堂自序》为基础，辅之以散见于报刊的相关文章以及许多珍贵照片，故名《冯友兰自述》。



● 三松堂——北京大学燕南园 57 号，冯先生的居所

目 录



故 乡 岁 月

家世渊源	/ 1
启蒙教育	/ 3
武昌读书	/ 4
跟着父亲在崇阳县衙门	/ 11
回到老家	/ 16
县官主持的考试	/ 20
开封求学	/ 23
沅君幼年轶事	/ 29

求 学 之 路

到上海读“中国公学”	/ 32
进入北大	/ 35
北大“自由学习”的传统	/ 41
口出狂言的辜鸿铭先生	/ 42

黄侃等先生轶闻	/ 44
蔡元培校长	/ 47
我的婚姻	/ 55
创办《心声》杂志	/ 58
进入哥伦比亚大学	/ 59
以中国人的眼光看美国	
	/ 61
留学生轶闻	/ 65
我也端过盘子	/ 68
教授生涯	
从广州到上海	/ 72
燕京大学	/ 76
被罗家伦“挖”到清华	
	/ 80
布拉格会议和保定拘留	
	/ 89
掩护闹“学潮”的学生	
	/ 93
离北京	/ 96
从长沙到昆明	/ 103
联大轶事	/ 106
联大纪念碑	/ 112
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	
	/ 116
讲学美国	/ 122
解放前夕的清华园	/ 129

清华园落下的十二枚炸弹	/ 133
初识徐特立	/ 137
出访印度	/ 139
参加华沙国际哲学会议	/ 145
与毛泽东的交往	/ 148
“文革”劫难	/ 150
望夫石	/ 155
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	
博士学位	/ 158
冯友兰年谱	/ 16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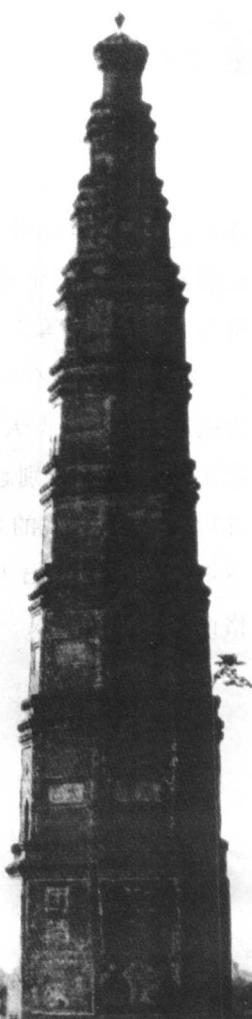
故乡岁月

家世渊源

1895年12月4日（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）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。

祖父名玉文，字圣征，有三个儿子。我的父亲行二，名台异，字树侯。伯父名云异，字鹤亭。叔父名汉异，字爽亭。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（1898年）科进士。伯父、叔父都是秀才。在祖父教育下，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，进入了“耕读传家”的行列。

听家里传说，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，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。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，本来是可以录取的，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，有人劝祖父去疏通，祖父不肯，就没有录取。祖父从此就不再去



● 唐河文峰塔。冯友兰儿时经常在此游玩



● 冯友兰
的父亲冯台异
(1866 — 1908)

应试了，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。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。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，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，传下来的几十首诗，编为《梅村诗稿》。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。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，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：

身处人间世，心怀太古春。
风流伊上叟，击壤作尧民。

是以邵雍的《击壤集》来相比的。

我的伯父也能做诗，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《知非斋诗集》。父亲也能做诗，有《复斋诗集》。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，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，留下的诗，家里的人编为《梅花窗诗草》。

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。我有一个偏见，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。宋代的严羽说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(《沧浪诗话·诗辨·五》)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。有些人学问很大，可以下笔千言，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，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，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，但就是不是诗。

启蒙教育

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，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。在清朝末年，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，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。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。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，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，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。

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，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，家里请一个先生，教这些孩子读书。女孩子七岁以后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，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学生有七八个人，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。我们先读《三字经》，再读《论语》，接着读《孟子》，最后读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。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，才算读完，叫做“包本”。有些地方读“四书”不仅要背正文，还要背朱（熹）注，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。

当时一般的私塾，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做八股文、试帖诗之用的书，如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之类，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，叫做《地球韵言》，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。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“新学”。我们家的那个私塾，也算是新旧兼备了。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，于“四书”读完之后，就读经书。首先读《诗经》，因为它是韵文，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。我于读完《诗经》之后，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。



武昌读书

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，以知县任用，分发到省里去。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，分发到哪一省，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。在清朝末年，这个朝廷公开卖官，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，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，当时称为“捐官”。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，在吏部分发的时候，也可以出一笔钱，不由抽签，而由自家指定，愿意到哪一省，就到哪一省去。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，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，称为“指省”。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，不愿到边远地方去，用“指省”的办法，分发到湖北。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，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，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，一直通往汉口。我们家乡这一带，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，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。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，都是通过唐河、汉江，到汉口的，所以汉口、武昌这些地名，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。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、武昌去的，我现在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他是一人先去的，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，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，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。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，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。所谓“候补”，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，去补那个缺。补上了缺，称为“得缺”。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，都是科举出身的，后来因为有捐官，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可是缺还就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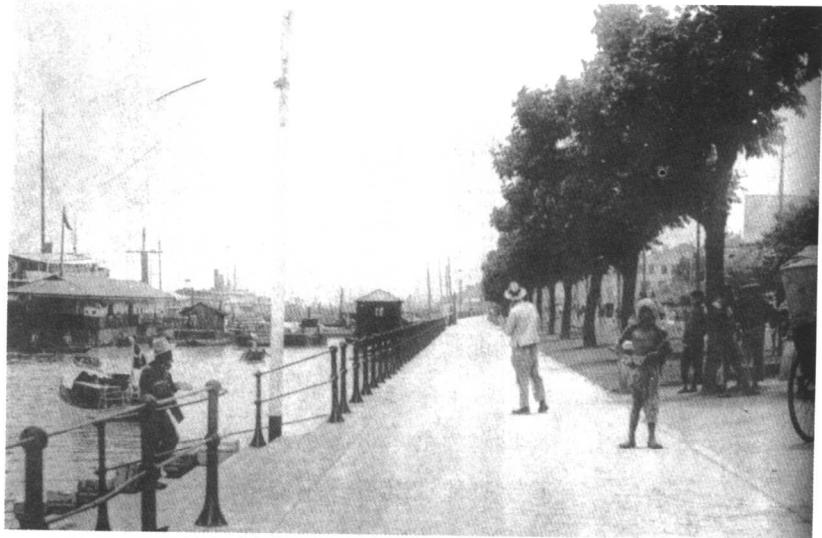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些，所以“得缺”越来越困难，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，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，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，称为“遇缺先”。没有“遇缺先”特权的人，就成了“遇缺后”了。所以《官场现形记》写的情况都是有的。

大概在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左右，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。那时候，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，他办了一些洋务，一些新政，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，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，叫“方言学堂”。学校的监督（相当于后来的校长）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。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（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）。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，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，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。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，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，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，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、妹妹淑兰（沅君）三人上武昌安家。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。因为在地主阶级中，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。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，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，可是路怎么走，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。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，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，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。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。可是有人说不行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，起码坐二等，三等就男女混杂，不成体统。坐船倒可以，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，跟别人不混杂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

● 晚清的
内河航运

靠才行。商量来，商量去，终于决定坐船。我有一个姑母，家住唐河河岸附近。她有个佃户有船，坐这个佃户的船，最可靠了，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，包他的船到汉口，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，先到她家里，再到河边去上船。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，在船舱里只能坐着，不能站起来。一上船，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，特别是说话，有些字像“翻”字、“滚”字都不能说。上船后，走了两三天到襄樊。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，船家又来告诉，说明天进汉江。这是大河，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，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。进了汉江，一路顺利，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。船先停在汉口，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。父亲来了，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不过要过长江，若是下了这条船，再上渡船，又下渡船，太麻烦，





● 晚清湖北武汉旧景

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。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，吓得惶恐万状，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。经过说服，他勉强答应了，但是嘱咐大家，把窗子都关上，一句话都不要说。渡过长江，搬到租的房子里边。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，一到这房子里边，都不舒服极了。

在武昌租的房子，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，里边只有一个天井。说它是天井，倒也名副其实，站在院子里看天，真像《庄子》所说的井底之蛙，坐井观天。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，院子没有内外之分，很不成体统，不像个样子。后来搬到黄土坡，天井比较大一点，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，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。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，习以为常了。

当时最大的问题，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。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。如果我要再大几岁，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。父亲很重视学外文。方言学

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，除了管吃管住外，每月还发几两银子，作为零用。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，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。可是我岁数不到，没有办法。附近也有小学，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，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。因为父亲相信，在学新知识以前，必须先把中文学好。他认为，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，学什么都不行。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，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，言语不通，他们很不放心。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，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。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，认识一些字，有些字只能读其音，不能解其义。不过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，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，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。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母亲监督着我们读，读熟了向她背，能背就行。遇见母亲不认得、念不出的字，就记下来，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。用这样的办法对付，我读完了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，还开始读《左传》。

照他们的计划，父亲还要经常出题，叫我们做文章。实际上只做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游洪山记》。住的地方黄土坡，离洪山不远。我们家的厨师，经常带我们到洪山去玩。有一次在洪山碰见一个洋人，带着一条洋狗，那条洋狗见着生人就乱咬，我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，并没有大伤。我们的厨师带我去找那个洋人，那个洋人拿出了几毛钱，我们不要，我们说，我们并不是为这几毛钱，只是要警告你，你的狗不能乱咬人。回家以后，我把这些情况说了，父亲大加赞赏，说这种态度很好。